

余光中的詩歌寫作與文化認同

路 羽

摘要：余光中在不同地域抒寫的詩歌折射了縈繞在他心中濃厚的中華情結。其對中華文明的認同過程無疑在無形間塑造了詩人多變的詩風。值得關注的是，余光中的文化認同並非一蹴而就，而是歷經從不自覺的文化認同跋涉至自發認可的階段，由此瞥見了詩人在中西碰撞中對於文化根源及漢語文明的不懈追尋，既是詩人使命感的體現，亦可謂是遊子心靈的歸航。

關鍵詞：余光中；詩歌寫作；文化認同

緒論

余光中，(1928-2017) 祖籍福建永春，生於江蘇南京，1947年入金陵大學外語系（後轉入廈門大學），1949年隨父母遷香港，次年赴臺，就讀於臺灣大學外文系。1954年，與覃子豪、鍾鼎文等創辦“藍星詩社”，主編《藍星詩頁》。後赴美進修，獲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學位。返臺後任師大、政大、臺大及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現任臺灣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

在余光中的作品中，思戀鄉土的情緒的抒發佔據了重要的位置。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和歸依，是余光中鄉愁作品精魂之所在，其濃得化不開的中國情結，是雖穿越歷史時空，歷經時代滄桑卻依舊懷揣的對於中國母親的那份情感、對中華五千年文

明的尊崇。文化的根基是詩人心底無法塗抹的印記，因而浸染着中華文明色彩的符號成為了余光中作品中出現頻率最多的音符與旋律。因此，我們有必要去研究詩人詩歌的文化認同與中國情結，讓其精神中滲透的美學、文化命脈得以傳承。

本文意圖通過對余光中創作的分析，探討余光中詩歌創作中“文化認同的自覺性”的轉折與呈現。余光中說：“我的血系中有一條黃河的支流”。詩人的創作也許正恰如奔湧的支流在不斷尋找着自我身份的構建與出路，卻也時刻在中華文明的源頭尋求着母體的靈性與傳承。回溯余光中的創作之路，詩人的中國情結也經歷在時間、空間、語言等維度上的離散與漂泊，時間的洗滌令詩人在溯洄間最終正視及堅守傳統文化命脈深處的蓬勃生機，亦攜帶着語言的瑰寶，歸於心靈感知、精神歸屬的家園。

一、對中華文化不自覺的認同

審視余光中早期的生命體驗與創作經歷，便不難發覺其不斷身處於離散狀態，輾轉於大陸、臺灣、美國等多地，在熱烈地擁抱着各地文化的同時，他無疑在長期經歷着所在地的西方文化與自身東方文化的差異的不斷拉扯及歷史的盤根錯節，經歷着文化身份模糊、錯位的動盪。

因而，在臺灣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現代主義文學”的論戰和七十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中，余光中似乎都是一位堅定的“現代主義”的先行者，如他自己所述，“少年時代，筆尖所染，不是希頓克靈的餘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釀的無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他的詩論和許多作品都強烈地顯示了主張西化、遠離傳統和脫離現實的傾向，帶有叛逆的少年意氣之感。例如《少年遊》中：“天你塌

下來我們肩住／海你沸起來我們挽住／地你動起來我們踹住。”文字中的氣勢呈現了余光中舍我其誰的創作意識。這股氣概也散播於 50-70 年代的臺灣詩壇中，在此期間，余光中幾乎參加了所有重要的文學論戰。尤其在 1977 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中，余光中所發表的《狼來了》一文將臺灣當時興起的鄉土文學視同大陸的工農兵文學加以批判。他說“回國半個月，見到許多文友，大家最驚心的一個話題是：工農兵的文藝，臺灣已經有人在公然提倡了！”余光中點名批判陳映真、尉天驄、王拓等人，因而與當時強調“文學反映社會”、“文學反映本土”的文學家決裂。

但余光中並非主張全面西化的詩人，在創作中的風格、體裁的流變與反復使得餘光中自稱為“藝術上的多妻主義”。在前期的創作之路上他經歷着傳統與外來文化的對沖與碰撞，詩人的文化認同在中西差異的縫隙間懷揣着苦悶之情找尋着出路。從美國返臺後，余光中曾提到：“我只是不甘心做孝子，也不放心做浪子，只是嘗試尋找，看有沒有做第三種子弟的可能。”可見，一切始於反傳統，但卻始終無法停止在傳統的根基上汲取養分。

最典型的作品之一是創作於 1960 年的《五陵少年》：“浮動在杯底的是我的家譜／喂！再來杯高粱！／我的怒中有燧人氏，淚中有大禹。”對歷史、家園的盡心透過各種歷史、傳奇、地名等的串聯而呈現了詩人無法泯滅的歷史記憶，在創作中所經歷的掙扎、放逐都無法塗抹傳統銘刻的印記，古典文化是時刻滲透於詩人的現代主義意識寫作中的。

再細細品讀次年余光中發表引起詩壇爭論的長詩《天狼星》，《大度山》作為其中的一章極寫了詩人在書齋中對於春天的想像與對文字的創見。中西交雜的句式與意象使得語言產生了對日常語言的悖離而形成實驗性質的作品。但在其中我們依舊能瞥見那些溶於血脈的古典痕跡：杜鵑花、卓文君、清明節等意象的出現在現實與

文化記憶間營造了深邃的歷史感。《天狼星》是余光中與現實主義過渡的冒險性嘗試，其所引起的論辯也使得余光中越發清晰地意識到民族風貌在個人創作生命中的意義。正因穿梭於傳統與現代交織的文化時空，詩人對文風的態度看似搖擺，卻在其中滲透着對於中華文明不自覺的認同。伴隨着所處地的變遷而出現的詩風變化實則都在點滴間加強着詩人回歸中國文學土壤的決心。

當海峽對岸的祖國大陸開始了史無前例的文革，《在冷戰的時代》一集便是余光中此刻情緒的記錄，一方面他對祖國大陸所遭逢的事件感到切膚的痛心和無奈，在《凡有翅的》一詩中，他反復詠歎：“中國啊中國你要我說些什麼”、“中國啊中國你聽不見我說些什麼”，這種痛心和無奈是一個愛國者的常情；另一方面他能夠清醒地把對國家的情感和對政治運動的評判區分開來，在《忘川》中“患了梅毒依舊是母親”的詩句集中、清晰地概括了詩人對祖國的態度，他在《在冷戰的時代·新版序》中明確解釋說：“梅毒”是對文革的否定，“母親”是對中國大陸的肯定。我肯定的是中國之常：人民、河山、歷史，而否定的是中國之變：政局動盪。如果說余光中在 60 年代初期發表《再見，虛無》時即正式埋下了從現代回歸傳統的種子。其後的創作之旅則令詩人越發勇於正視於根源深處持續呼喚着他的創作意識與人文血脈。余光中在時代的詩潮中大膽轉身，打破、揉碎自身的現代生活經驗，於詩行中越發坦然地擁抱自己的中華文化認同，夢回那個搖曳着古典語境的盛唐。對“從何而來，向何而去”這一問題的不斷思考讓餘光中在焦灼的環境中逐漸明晰了詩性的智慧。中華民族的歷史將蘊藏的詩性資質淘洗、整理，並將這不自知、不自覺的文化認知逐步喚醒。

二、對中華文化自覺的認同

詩歌猶如穿牆術般能在閱讀體驗產生的一瞬擊破人們心中的藩籬，其不受制於常識所行成的障礙，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在他者的心靈引起震撼。是因為詩歌是人類心靈、靈魂、人的存在的直接產物，是這些抽象事物的現象學。¹而能歷久彌堅的作品則必然以最本真的力量牽動着人類心靈深處最深層的情感與羈絆。對於漢語語境中的創作者及讀者而言，這份羈絆則必然與漢語文明中的歷史記憶、文化記憶緊密相連。

因而，在經歷了在現代主義與中華古典之間的綿長拉扯後，余光中所尋求的創作根源重歸華夏。其對中華文化的摯愛、呵護與堅守越發鮮明地湧現於詩作之中。余光中認為，“只要倉頡的靈感不滅，美麗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當然長在。”正是這磁石般的向心力，將余光中與中華民族文化緊緊地吸附在了一起。作品中體現的文化認同感亦呈現了向中華傳統中正本清源的文化根基靠近的趨向。

從一時期開始，余光中創作了大量的鄉愁題材作品以展示對於故鄉、故土的眷戀與追慕，這種感情根植於他“21歲以前在那華山夏水笑過哭過的日子”，那牢牢烙在他記憶底片上的鄉愁情結，在他的詩歌創作抹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在膾炙人口的《鄉愁》之餘，自1974年起的十年在港期間，余光中在詩歌領域持續通過一系列懷鄉主題作品表達其自覺的歷史使命感。《與永恆拔河》、《隔水觀音》、《紫荊賦》這三集通過英雄人物來體現愛國傳統與民族情懷。《刺秦王》歷數田光、樊于期、荊軻、秦舞陽、燕太子丹、高漸離、張良及陳勝、吳廣等人志在滅秦的壯

¹[法]加斯東：《巴什拉·空間的詩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頁。

舉，類似題材的還有《梅花嶺——遙祭史可法》、《昭君》等，此外，1977年寫就的宏偉、深邃的《黃河》：“……白髮上頭的海外遺孤/半輩子斷奶的痛楚……黃河的奶水沒吮過一滴/慣飲的嘴唇都說那母乳/那滔滔的浪濤是最甘，也最苦……”，在展現黃河古老文明的長幅畫卷之中，歌吟了“最老，最年輕”的黃河“母親”的恩德，抒發了一位“白髮上頭的海外遺孤/半輩子斷奶的痛楚”，即使浩浩的渾水算不上美，卻令詩人凝望得口渴唇乾，黃河是民族精神的大載體，詩人將強烈的民族意識化作奔騰的黃河，湧動在自己的血脈中，又將那奔騰眷戀情緒化作了奔騰的詩。可見這一時期的詩歌創作從中國傳統文化汲取不盡的靈感，自覺地從中國歷史文化的視角進入對兩岸阻隔的現實和個體幽秘內心的審視，以綿細委婉、悲鬱愴傷的語言歌吟甜美的鄉愁，並在超越現實的歷史語境中表達個人深重的人生感悟，從而使他的詩歌打上了非常深刻的民族文化的印記。詩集《蓮的聯想》亦自古典詩詞中進一步汲取養分。詩人欣賞蓮飄然不群的風範和情操，沉浸於“出淤泥而不染”的“蓮的情結”之中，蓮已被擬化成具有東方之美及人格生命意識的美學意象，以“蓮”為意象抒發詩人對人生、命運、永恆的理性探索。余光中在此淋漓盡致地發揮了他精深的古典文學修養。並且，他也在這種創作手法裏神遊故國，寄託了自己對於故國文化的無限眷戀。

此外，對於中國傳統文人追求理想的人格和逍遙的人生態度的推崇也體現了這一時期余光中文化認同的傾向轉變。羈旅母題的傳統啟發詩人將憂國、憂民、憂家的內心傷痕再現，將鄉愁意識的悲戚轉為宇宙意識的徹悟，詩人們開始張揚着一種悟覺、逍遙的人生情懷。詩人尤為讚賞魏晉名士與李白空靈玄遠、清拔飄逸的風格，他的李白系列對歷史題材的翻新，以新的視角和意象對傳統題材進行創造性的運用，表達了對李白的人格精神及“天人感通”的逍遙人生的嚮往，如《夢李

白》、《戲李白》、《尋白》、《念李白》和《與李白同遊高速公路》等詩篇。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的重要體現是對理想人格的追求和生命價值意義的崇高體驗，因而，這一階段的余光中已然過渡至自覺的對中華文化產生認同，是全面化、主動化的追尋。不僅流於形式、意象上的借用與參照，詩人同樣尋找着精神內核上與中華文明的共振、共生。中國知識份子在歷史中形成了關注社會並積極投身其中的思想傳統，強烈的現實悲憫情懷已成為他們的自覺追求和理想人格。詩作《我之固體化》即展現了余光中的民族自尊與渴望“中國太陽”的溫暖的心情。對中華民族文化精神中的憂患意識的沿襲，使得余光中的中華文化認同與民族的血脈愈發相融。可見，地域分離的局面雖造成了特定的歷史與文化的斷裂現象，但余光中最終選擇將眼光轉向歷史，轉向悠久、燦爛的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底去汲取足以自豪與驕傲的力量源泉。這是余光中逐漸將中華文明中飛逸騰躍、圓融渾成的氣韻納入個人的審美個性之中的漫長過程。形成對中華文明的自覺認同並非是一蹴而就的選擇，而是文化底蘊與早先經驗在積澱後的噴薄而出。

三、遊子的回歸

余光中將食古不化者稱為“孝子”，把食洋不化者稱為“浪子”，而把那些向西方取經終於回歸民族與傳統的人稱為“回頭的浪子”。總結余光中詩歌創作歷程的認知定位，何嘗不是遊子對故土的回歸？對於民族意識的感悟和對華夏文明的眷戀，又何嘗不是飽含詩人情感的選擇？

余光中將自己對大陸的感情，比作是一種母子關係，骨肉相連般的親情連結使詩歌的中國情結得到進一步昇華，這樣的一種表達更體現詩人與中華大地同呼吸的深切情感。曾經余光中在《從母親到外遇》中寫到：“‘大陸是母親，臺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歐洲是外遇。’我對朋友這麼說過。大陸是母親，不用多說。燒我成灰，我的漢魂唐魂仍然縈繞着那一片後土……”²正是這一份在文化及地理上對故土家園的深深眷戀使得他把大陸放在了“母親”的至尊位置上，母親歷來是人們心中最溫馨柔情的心理情結根系。“家”意味有母親的地方，意味着個體的生命起源，更是其心理文化的根源土壤。

既為遊子，余光中的作品中不乏溫情脈脈的人倫關係和極具東方傳統精神的親情描寫。對親情的讚美與對故土、鄉愁的歌吟互為表裏，共同體現他對五千年文化的自覺護衛。余光中在《守夜人》中曾這樣自述“五千年的這頭還亮着一盞燈……最後的守夜人守最後一盞燈/只為撐一幢傾斜的巨影”。在臺灣社會西化的滾滾潮流中，他以傳統文化的最後堅守者自居，充滿着對中國文化的激情據守和對這種文化漸趨失落的殷憂。這種自覺的承擔拯救意識不僅包孕在熱土難離的家園抒寫中，也蘊藏在人類原始情感的表露中。例如《招魂的短笛》和《登圓通寺》皆抒發了對母親揮之不去的追思憶念之情，在這類詩中，母親的形象往往與祖國的形象重疊，鄉情與思母之情亦合二為一；《珍珠項鏈》歌詠了與妻子三十年間相扶相守、堅如磐石的婚姻生活，滿盈對妻子的讚美與謝忱；《面紗如霧》一詩中固然有白雲蒼狗、白駒過隙的人生慨歎，但更多的是情意纏綿的父女情深，它抒寫女兒成婚之際，“我”的遲疑不舍，體現了父愛的慈愛溫藹。《抱孫》描寫了初降人世的外孫的純真之美，流溢着掩飾不住的喜悅之情。在這些表現親情的詩作中，其滿蘊的是

²轉引自江少川：《鄉愁母題、詩美建構及超越——論余光中詩歌的“中國情結”》，《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

傳統文化對他心靈鐫刻的不朽魅力。

此外，詩人亦通過對於山川風物的地理抒寫以展示其遊子的故土情結。在詩中反復吟詠謳歌的對象涵蓋廣泛。1992年，余光中應邀訪問大陸，此後，詩人的鄉愁詩進入解構期。他多次尋訪大陸，每至一處都留下了歌詠故國家園的詩篇，啟動凝滯在記憶洪流中的古跡與文明。余光中說：“我的鄉愁從此由浪漫階段進入現實時期。我祖國大陸之行的心情相當複雜，恍若夢中。”當詩人寫就詩歌《登長城》，即描繪了詩人自寶島踏上祖國大陸後的情緒感受，詩中“一條飛不走遊不去的古龍”，正象征着中華文明相容並包的多元文化觀，而這意蘊豐厚的圖騰千古不散地飛在中華大陸的上空，也永恆盤桓在詩人的思巢中，“這一塊一塊專療的古方，只一帖便愈”則將長城磚比為了一個個古方，只因登臨長城也了卻了自己魂牽夢縈無法釋懷的鄉愁，更以慰詩人的古典文化鄉愁，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以至於數千年文明歷史的年輪時刻召喚着遊子，而在真切面對故園河山的一刻，余光中的思緒不僅囿於具化的景致，他遇見的是惦念、神往多年的文化凝聚力及以道自任、任重道遠的使命感。而令這種文化認同得以綿延並始終帶有生機的則是漢語潛藏不露的深層文學與美學觀念。鄉心不散，只因漢語文明不散。

結語

余光中的人生經歷將其鄉思積蓄而成了深沉厚重的佳釀，以至於棲身的每一處都成了中國情結的出口。余光中自開始新詩創作以來，無論身處何處，植根大陸的民族意識、漢語文明始終隨行在其潛在意識之中與他積極地求索着關於漢語發展的可能。正如余光中在採訪中曾言的人生三階段：“不知道自己是誰，知道自己不是

誰，知道自己是誰”。對自身文化認同的正視與此後的鮮明化，正體現了中華情結對於他而言是“剪不斷碾不絕一根無奈的臍帶”。沿着中華文明呼吸的脈絡，漢語新詩始終引渡着詩歌的遊子向文化命脈及生命真實的回歸。